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 宋志明 向世陵
姜日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 宋志明 向世陵
姜日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宋志明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ISBN 7-300-02719-9/B·255

I. 中...

II. 宋...

III. 哲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6667 号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宋志明 向世陵 姜日天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码 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 1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70 000

定价: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有过组织编写研究生教材的动议。但那时,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尚欠规范。不仅各类课程基本上按二级学科(专业)设置,口径偏窄,同一一级学科甚或二级学科(专业)的课程,差异亦很大。而且,有些课程,也与大学本科阶段拉不开档次,教学内容重复。所以,编写研究生教材这项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只是在某些学科或专业做过尝试,并未提上整个学校的议事日程。

1996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思路,并且,根据培养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相应调整了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以此为契机,从1997年起,我们对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1)适当加大课程教学在整个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比重。(2)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培养阶段的课程设置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拉开档次。按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设置课程,确定教学内容。(3)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领域,在学科门类内设置所有专业通开的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4)统一课程设置标准,建立一套由公共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四个类别组成的规范化课程体系。

打下了较为规范化的课程体系这个基础,我们即着手组织编

写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所编教材的重点是：全校所有学科通开的公共课教材以及分别在各个学科门类通开的学科基础课教材。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我们组织编写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教材。

编写研究生教材，本来就是一件新鲜事物。编写建立在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基础上的硕士研究生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教材，难度就更大。因此，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既具有探索性，又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当然，我们深知，这一批以及今后将陆续出版的硕士研究生教材，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还需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我们也深信，只要方向明确，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将会日臻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材工作委员会

1998年3月22日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材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林 岗

副主任: 杜厚文 周新城 秦惠民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彦 王 霁 刘大椿 许征帆 吴易风

胡乃武 徐二明 高培勇 曾宪义

秘书长: 高培勇 (兼)

目 录

绪论：中国哲学的精神	1
第一章 天人之辨：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30
第一节 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30
第二节 天道与人道	36
第三节 天人合一	42
第二章 生成流变：认识宇宙	61
第一节 生成与变易	61
第二节 气化流行	72
第三节 天行有常	80
第三章 形而上下：本体论诠释（上）	91
第一节 思考“本体”和提出“上下”	91
第二节 本末体用之辨	97
第三节 论道与辨气	102
第四节 析合道器与道器非异	106
第五节 有形无形皆气	110
第六节 天下唯器与前气后形	112
第四章 心性之辨：本体论诠释（下）	121
第一节 尽心知性	121

第二节	无心顺性与识心见性·····	125
第三节	大心与心即性·····	129
第四节	性体心用与心统性情·····	132
第五节	心即理与性即理·····	136
第六节	心外无理与心外无性·····	141
第五章	一两分合：辩证思维传统·····	148
第一节	物生有两与一分为二·····	148
第二节	中庸为德与中和之道·····	154
第三节	执一统众与一多相摄·····	156
第四节	一物两体与无独必有对·····	159
第五节	一衍为万与理一分殊·····	163
第六节	合二而一与分二合一·····	170
第六章	格物致知：知识论辨义（上）·····	180
第一节	“格物”释义·····	181
第二节	见闻与知识·····	187
第三节	德性与智慧·····	194
第七章	知行互动：知识论辨义（中）·····	204
第一节	知易行难与行而有知·····	204
第二节	知先行后与行重知轻·····	209
第三节	知行相须与并进互发·····	216
第四节	知行合一与知行兼举·····	220
第五节	行可兼知与垂意习行·····	223
第八章	涵养工夫：知识论辨义（下）·····	231
第一节	养心、致一与主静、用敬·····	231

第二节	涵泳本心与致良知·····	235
第三节	留心澄意与虚以生明·····	242
第九章	人性善恶：价值论探源（上）·····	248
第一节	明善与辨恶·····	248
第二节	性三品与复性论·····	255
第三节	主静与重习·····	260
第四节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263
第五节	天理人欲与道心人心·····	269
第十章	成人之道：价值论探源（下）·····	282
第一节	求道与求真·····	282
第二节	尽善与尽美·····	289
第三节	寻孔颜乐处·····	294
第四节	由内圣开外王·····	297
第十一章	治世之道：社会历史观概览·····	307
第一节	先富后教·····	307
第二节	王霸之辨·····	312
第三节	理势合一·····	318
第四节	小康与大同·····	324
参考书目	·····	334
后记	·····	338

绪论：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发展情况，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因此，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就不能不对中国古代哲学及其现代价值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先哲就创立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古希腊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源远流，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哲学以其特有的精神风貌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

哲学同科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跟民族性有密切关系。科学同民族性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数学、化学、物理学等等，没有必要区分什么中国数学、美国化学、英国物理学等等。哲学则不然，它同民族性息息相关，法国哲学不同于英国哲学，英国哲学不同于俄国哲学，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跟其他民族的哲学都不一样，有其特有的民族性。它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我们在学习和

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首先应当着眼于它的独到之处，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对于中国哲学精神实质的了解和掌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进行比较充分的材料积累，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形成自己的一种看法。我们对中国哲学精神实质的了解和掌握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何谓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中国哲学研究中常讲常新的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答案。我们主张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各种学术见解都有发表的机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中国古代哲人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在他们看来，宇宙是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孔子曾站在河边，面对奔流的河水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像流水一样，永远处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旧的东西消灭了，新的事物又产生出来。宇宙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有的西方哲学家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家却认为太阳底下总会出现新东西，他们称为“变化日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有风格。古希腊哲学家从“有”（存在）开始他们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家从“生”（形成）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由于彼此的思路不同，古希腊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是原子论，而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是元气论。“气”与原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宇宙万物的质料因，又是宇宙万物的动力因。这种动态的、

有机的宇宙观是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

中国哲学家立足于动态的宇宙观，也以“生”作为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原则，他们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高扬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哲学教导我们，尽管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总会遇到艰难险阻，但前途毕竟是光明的。按照《易传》的说法，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易传》在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序时指出，《易经》之所以把“未济”卦放在最后，就是表明发展、生化的无限性，帮助人们燃起心中的希望之灯。这种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的意识无疑是中国哲学的精华。它代表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腾飞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帮助中华民族渡过一道道难关，坚韧不拔地向着光明的未来迈进。

中国哲学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先哲留给我们的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历来受到近现代先进思想家的重视。这些思想家发扬中国哲学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洪流。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伺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严峻形势，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未失掉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从未失掉中华民族必定腾飞的坚定信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多次武装斗争，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他毫不气馁。正如他所说：“至诚无间百折不回，……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2]。孙中山的“百折不回，愈挫愈奋”的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近代的发扬。孙中山还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进化论思想结合起来，使之获得近代的理论形态。他认为天下之事并不仅仅是渐进发展着的，有的时候可以打破常规，后来居上。因此，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能够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他坚信，中国必将会迎来“突驾”、“腾飞”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使之获得现代的理论形态，化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豪迈地宣告：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3]

在这种包含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革命乐观主义的鼓舞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面对重重困难，党和人民并没有退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党中央工作，发扬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拨乱反正，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快扭转了局面。他及时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在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无疑也蕴含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实事求是

与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相一致，中国哲学家特别关注现实问题，使传统哲学形成注重人生实践的品格。《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实事求是”一语恰当地概括出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品格。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哲人不怎么看重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特别看重理论的实践效果。他们的哲学往往不是仅仅写在书本上，而是体现在他们的人生实践中。例如，孔子本人并没有写出大部头的著作，只有弟子们记载他的言论形成的一部《论语》，然而他的行为举止却是后世儒家效法的楷模。孔子也正是因此而获得“世界文化名人”的盛誉。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注重实践已形成一种优良传统,大多数哲学家都非常重视“行”。“行”的原义是脚踏实地、走在路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行的解释是:“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属,皆从行。”从“行”的原义里可以引申出践履、行动、探索、活动等多种意思,把这些意思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实践。行包含着目的性,对于目的清楚了解和准确定位,就是中国哲学中的知。所以,中国哲学中的知并不是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知识,而是与行、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这种知识来自实际,指导实际,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把知与行相提并论,强调知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实事求是、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照孔子看来,只会背诵《诗经》上的诗句,既没有从政的本事,也不能在外交场合担任专对应酬的使者,这样的人算不上有学问。换句话说,学习书本知识并不是目的,目的还在于应用。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比孔子更明确地提出行重于知的思想,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5]他把行视为检验知的标准,视为求知的目的,认为知服务于行,行比知更为重要;倘若脱离了行,知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也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知行脱节。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6]他认为言论和行动应该是一致的,如果“务虚言而馁行,虽辨必不听”^[7]。在他看来,说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关键还在于办实事。只有努力地办实事,才能求得真知,收到实际效果。“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早)朝宴(晚)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8]墨家把“赖其力而生”、“强力以从事”视为处世的准则,勇于实行,勇于探索。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墨家培养出一批杰出的

科学家、能工巧匠以及擅长防御的军事家。

有些人以为道家喜欢玄想，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道家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或墨家有分歧，但在注重实际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分歧。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而道内含着“行道”的意思。道家历来反对把道只当作言说的对象，而大力倡导身体力行的精神。在《道德经》五千言中，我们透过那些貌似玄虚的语句，很容易发现老子对实际问题的关注。他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而无不为”等观点，对于经邦治国的社会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在当今时代仍然受到政治家们的重视。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其就职演说中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以说明自己的施政纲领。

除了先秦的主要思想家外，后世大多数学者也都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东汉哲学家王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实践是认识形成的客观基础，他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9]齐都、襄邑等地方的姑娘那双善于刺绣或织锦的巧手并不上天生的，而是在劳动实践中练出来的。如果有充分的实际练习，笨姑娘也会拥有一双灵巧的手；反之，不参加实践，再聪明的人做最简单的事情也会显得笨手笨脚。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主张“在事上磨炼”，也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清初哲学家王夫之说：“有即事以求理，无立理以限事。”^[10]清代哲学家颜元更是旗帜鲜明的倡导“实学”，强调习行、践履对认识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只有接触客观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实也。”因此，“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11]。他主张“习而行之”，“亲下手一番”^[12]。比如，要想学会弹琴，就必须亲手操弄；如果只是背诵琴谱，无论背得多么熟，都不能叫会弹琴。

中国古代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

的遗产，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3]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把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邓小平同志正确地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推倒“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找到了一条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三、辩证思维

与注重发展、注重有机联系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比较发达。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的那样：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关于有机的宇宙的哲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利高津也有类似的想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等问题，历代哲学家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已达到欧洲中世纪不可比拟的程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为基本范畴，形成了三个学说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道家的辩证法，以老子为代表。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辩证法大师，他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提炼出矛盾原则，揭示出对立面双方相反相成的矛盾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不仅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认识到“反者道之动”的否定原理。他指出，矛盾着的双方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4]。他把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概括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15]。在老子看来，道的这一特性很难用普通概念说清楚，必须借助于否定的表达方式，他把这叫做“正言若反”。例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6]形容“直”的最恰当用语不是“最直”，而是“若屈”，老子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违于常识的看法，其实正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知灼见。

第二个系统是兵家的辩证法，以孙武为代表。《孙子兵法》十三篇虽是一部军事学专著，但其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战争是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自然是敌我双方的矛盾。孙子要求指挥员全面地、辩证地看待敌我关系，牢牢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要想克敌制胜，首先必须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找敌人的弱点，抓住战机，“以石投卵”，一举获胜。这就是他提出的“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思想。孙子主张灵活地处理好利害、奇正、虚实等矛盾关系，发挥我方的优势，打击敌方的薄弱环节，实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术。要做到我想打，敌人即便据守高垒深沟也不得不打，因为我们袭击了敌人不能不救的要害之处；我不想打，就是画地而守敌人也无可奈何，因为我方已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去了。孙子以水为喻说明用兵之道的灵活性：“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17]有趣的是，孙子和老子都以水喻兵，但取意不同。老子取意于水的柔弱，表达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孙子取意于水的灵活性，表达了积极促